

书评

← (上接7版)

李四光为武大请来的设计师是美国人开尔斯，书中详细考证了开尔斯的生平、游历、婚姻，知道他在美国就读过的五所学校里有三所校园建在湖边；知道他是教会建筑师的身份来的中国，也曾参与过中山陵工程设计方案竞征；还知道他年纪不大已经满头白发，人们回忆之中以为这位大设计师是位美帝耆老。不过这位少白头的设计师身体确实不好，武大一期建筑中的一部分，是由大名鼎鼎的“上海彦沛记建筑事务所”的设计师们协助完成的，“彦沛记”是李锦沛与亡友吕彦直一起创办的事务所。作者关注到参与南京中山陵设计的李锦沛，为珞珈山上的武大校园带来了深远影响，“在南京紫金山与武昌珞珈山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第五章第二节“南北”与“东西”)，这可以从今天的校园内的文学院大楼、男生宿舍拱券以及第一期建筑中的中式屋顶等许多地方，看到这种联系。至于武大校园里的一则著名的段子，关于狮子山顶图书馆轴线两侧文、法二学院的屋檐，文乃“文采飞扬”，法则“法理正直”，作者也从建筑风格一致性的角度做出了解释，未必是出于美国设计师对中国文化的谙熟，反而可能还违背了开尔斯某些最初设想。

作者对珞珈山南北的建筑与空间分布的稔熟，在全书第四、第五章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把珞珈校园的设计思路一一展示，也找出了具体单体的设计参照成果，如参考南普陀大悲殿顶的图书馆中央塔楼屋顶，或是参考美国哥大图书馆拜占庭顶的理学院主楼，抑或1929年校园平面图中，借鉴闽江畔福建协和大学的设计，让读者体会到

武大校园空间形成的层层因缘，因为这里每一栋建筑背后都是有来由的，所以这个校园才是独一无二。

于民国校园“小空间”的研究中，那些校园设计师的话题，无疑非常引人注目，如同书中大段的篇幅留给了开尔斯、李锦沛等人生平与风格，也谈到这个时代的设计风格、尤其是校园建筑的源流特点及代表人物。作为武大校园设计参考的作品与设计师中，有一个名字在书中不止一次被提到，他的中国名字叫茂飞(Henry Killam Murphy, 1877—1954，又被译作亨利·墨菲)，同为美国人的他与开尔斯几乎无甚联系，李锦沛与亡友吕彦直倒是曾与茂飞共事过。茂飞可以算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领域“最熟悉的陌生人”，陌生是因为他在今天的名气实在有限；熟悉则是因为他的作品，依然是今天最好的大学的建筑。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艺术系(那时尚无建筑系)的茂飞，受耶鲁大学赴华传教的雅礼会(Yale Mission in China)之邀，来华设计雅礼会在长沙创办的雅礼学院校园建筑，当日长沙城北麻园岭上的红楼建筑群，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学院的校长颜福庆应该与茂飞有过一段非常好难忘的合作经历，也颇服膺茂飞的建筑作品，十余年后他在上海肇嘉浜南岸主持建造的上海医学院及医事中心的建筑群，无疑是受麻园岭上湘雅红楼的影响。颜福庆堂兄颜惠庆的好友、时任复旦大学的校长李登辉，是茂飞在耶鲁的同届同学，茂飞在数年后为复旦在走马塘畔同样设计了一片现代化的校园。就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几年，同为耶鲁毕业生的周诒春，邀请茂飞设计了清华的“四大工程”；前雅礼会同事德本康夫人(Mrs Laurence

Thurston)，则请他设计了金陵女大(今南师大随缘校区)；而司徒雷登约他设计整个燕大的校园(今北大燕园)。另有前述福建协和(今厦大)、上海沪江(上海理工)、广州岭南(今中大)、上海圣玛丽(原属东华，今辟为商圈)等多所知名大中学校建筑，皆出自茂飞与他的事务所手。而他事务所里也走出了多位近代中国的一流建筑师，除了上引吕彦直、李锦沛，设计上海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八仙桥青年会大楼的范文照、赵深，大上海计划的设计师董大酉，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杨廷宝等，都曾与之共事。茂飞为中国大学带来美国前总统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大学校园设计的“Mall”式风格[亦称“Academical Village(学术村)”格局]的同时，大量借鉴中国古典建筑样貌，形成其自己的“adaptive architecture(适应性建筑)”风格，影响了包括武大设计者开尔斯在内的不少校园设计者，所以他也不得不成为《珞珈筑记》中那位“不在场的在场者”。

艰辛而顽强的创校过程

读者从书中可以轻易感受到建成武大校园后的喜悦，但与之伴随的是创校时遭遇的各种困境。这几乎是每一所新创中国近代学校所共同经历的辛酸；只是这一次，我们有幸从作者的考证工作与丰富的档案文献中，直观感受欣喜外的那一份顽强与艰辛。

武大于国民政府时期新创，首先遇到的大问题是校址；正所谓“高不成低不就”，最终一步步找到了郊外的湖畔山间，前文已及。而其直属管理机构，近两年后也从湖北政务委

员会，换到桂系政府，再有蔡元培的“大学院”设想与“第二中山大学”的插曲，直到蒋桂战争结束、南京国民政府控制武汉，王世杰才得以放手建设。另一个棘手的问题——经费，继而成为创校最大的障碍。

作者在全书第四章“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与支出”中，详细考察了前后两期工程的经费来源，以及重大缺口的填补与日常的化缘，内容不乏荒诞与无奈。第一期向桂系政府及李宗仁要钱建校时，身为南京部长的蔡元培明确来信告诉李大师，南京政府没钱，要他“就地筹拔”。而晚年的李宗仁回忆，自己当时对着一百五十万的建设预算时，慷慨表示义不容辞，随后拨出了二十万，就再也没有下文了。1929年匆匆上任校长位的王世杰，于当年借停留南京的短暂时间，四处筹款。虽然蒋介石口头答应支持武大建设，但到了主管财政的小舅子手里，却只有一句南京中央“一个钱都没有”，最后由湘籍元老谭延闿出面，宋子文才答应了分十五个月付清的七十五万，但那笔钱还是得从桂系控制的两湖国税中出，而这笔收税本来就是当时宁汉争夺的焦点；蒋桂战争前，武大实际也未拿到拨付。轮到南京政府埋单建设费的时候，推诿与延迟同样在发生，单就这笔早早答应了的七十五万，甚至到了四年后的1933年暑假才拨清。仅此款项所费周折如此，其余困难就可想而知了。至于二期建筑中，校领导同仁使出浑身解数，向地方政府、外省政府、庚款基金会、平汉铁路管委会及首义功勋黎元洪的后人，屢化布施，才得有日后这一栋栋建筑拔地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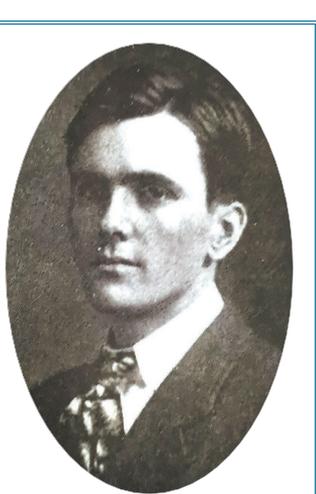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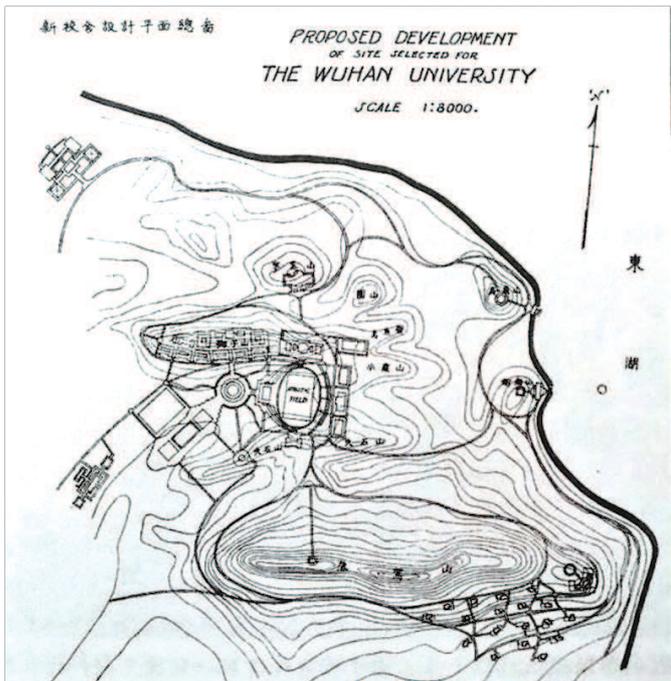
经费困难，自然影响项目招标，在武大第一期建筑文、理学院，男生宿舍等建筑群的招投标过程中，即便报价最低的汉口汉协盛的价格，也超过了之前的预算，李四光、叶雅各与开尔斯分别与汉协盛继续谈判，希望价格降低，最终达成。在第三章第二节，我们读到作者用充满温情与敬意的笔调，表彰为武大建设倾其所有的民营营造业老板沈祝三，因为沈祝三与汉协盛低价保质地建造武大一期工程，使得汉协盛在工程进程中出现巨额亏损，但沈祝三不愿半途而废而申请破产，通过抵押资产，坚持将武大的工程保质保量完成。汉协盛所欠本利最终达百万，甚至到抗战武汉沦陷后，才还清本息，沈祝三本人也于其后在汉口逝世。



1929年匆匆上任校长位的王世杰 奋力筹措建校经费

沈祝三(1877—1940)，浙江鄞县人，武汉建筑营造业宁波帮的领袖，他身上不仅有宁波商人在生意上敏锐诚信的特质，从他晚年投身武大建设的气魄来看，他与早年活跃汉口的叶澄衷一样，秉承宁波人劝学重教的风尚。近代以来宁波商帮，从叶澄衷父子，虞洽卿、朱葆三到当代的邵逸夫，虽个人读书不多，但无不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良多，相较之下名气稍逊的沈祝三，同样用毁产业办新学的举动，践行宁波帮与民间力量的决心与信念。

原本以为全书第六章“藏修息游焉：珞珈湖山风景与大学校园生活”的内容已远离了武大的创校与建设，大有鸡肋之嫌，但近来再翻此书，独对第六章中描述的东湖湖光阁、行吟阁等处，竟也钟情有嘉。原本看重故纸堆里的学问，以为旧史不易得，而湖光山色毕竟易得；然而直到连日家居之后才知道，游冶之兴、山水之乐之珍贵，读此章中王世杰陪胡适坐汽油小艇往来东湖，恨不能此时也来一游。至于书中记录的民国武大男女生宿舍、教室、食堂内外热火的生活百态，这几日读来更是感慨颇深。我们确实不易分辨自己当下幸福与否，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的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在以前再平常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暂时不能达到的幸福。这个冬去春来想必能让我们明白很多，比所有书里、老话里、网络信息里告诉我们的都多。作为一本关于武汉历史的书，《珞珈筑记》无疑有它极强的专业性，不过在最近读来，你会依稀感受到书中隐含的武汉这座城市中的苍茫与激昂，这种倔强的气质激励着几代人不断接力，把现代高等教育的旗帜，牢牢扎在珞珈东湖之上。



1929年，开尔斯(右)、李锦沛设计的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平面总图